

元代文人多元化心态

王潞伟

—

元代文人多元化心态

作者： 王潞伟

摘要：本文以元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因素为前提，对元代文人多元化心态进行探讨，运用浪子、智者、隐士、斗士、苦恼者、梦中人等角色，生动形象地对元代文人多元化心态进行分析。避免了抽象概念分析的枯燥乏味，并且有利于对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学作品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们的失落、矛盾、幻灭、叛逆、梦幻等多元化心态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真实的反映。

关键词：元代 文人 多元化 心态

孟子《孟子·万章》“知人论世说”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事也。”戏剧学家么书仪前辈说：“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熬煎，这种痛苦与矛盾的文化性格，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也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1[1]}在这个以蒙古民族为统治阶级的黑暗年代里，仁义道德被强权武力踏的粉碎，知识分子们传统价值观被严酷的现实击的瘫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上科举废止，使得这个时代的文人仕进无门，沦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其生活的贫困、精神的苦闷、理想的破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激愤的时代，必然产生激愤的声音。元代的激愤之音通过杂剧而啸聚，杂剧于是成为时代沉重奏响的黄钟大吕。”^{2[2]}因此，元代文人必然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心态，而正是这一特殊时代文人为我

^{1[1]} 么书仪著《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1页。

^{2[2]} 廖奔、刘彦君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第183页。

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彩夺目的元曲文学，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积极探讨。分析如下：

一、放荡不羁的浪子心态

正如卡缪所说“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的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回忆，而同时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会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外国戏剧》1980年第1期）^{3[3]}元代社会的黑暗、统治的残酷、科举的长期废止，使得文人仕进无门，随之产生放荡不羁的荒诞感，人的信仰，希望都崩溃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浪子形象。此种浪子心态是变形的、扭曲的。如关汉卿的玩世不恭的散曲作品【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其创作的自觉性，元代文人通过散曲戏曲的形式来倾诉心中的郁闷，以浪子心态批判那个无理性、混乱的、荒荡不经的社会。

元代知识分子就是这些远离原有的生活轨道的放荡不羁的“浪子”。这种心态不仅有安乐享受的一面，而且也包含着个性解放的追求，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率性而行，他们明确地认识到了官场、现实和个性自由的矛盾，因此他们总是把归隐、避世自由自在和官场、现实的凶险、受拘加以对照，表现出他们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如宫天挺《七里滩》中严光歌唱着“散诞心肠，放浪形骸”的自由自在，甚至认为做皇帝也要受拘束，道出：

您每朝聚九卿，你须当起五更，去得迟呵着那两班文武在丹墀候着等，俺出家东纳被蒙头黑甜一枕直睡到红日三竿犹兀自唤不的我醒。”

4^[4]

3^[3] 本条转引自张月中编《元曲通融》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第152页

4^[4] 廖奔、刘彦君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50页。

元代文人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既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是泯灭物我大化于自然，而是赤裸裸地贵己重身，这颇类似于先秦杨朱“为我”之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元代文人大多视富贵如粪土，逆流俗而不合，轻礼法而任性自为，以充分自觉的自我意识去追求生活本身的价值、乐趣，形成独特的浪子心态，进而要尽情地享受这有生之年，充分地满足生命的自然要求，包括生理欲望和精神欲求，这才是生命自身的最高价值。关汉卿“我玩的是梁圆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他们对主体生命的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传统思想的雷池，而显示出新的风度。一方面，元代文人的倜傥不羁并不象唐代文人那样以狎妓漫游作为入仕的一种途径，元文人是以表面的豪旷放达来排遣内心的深层的悲哀、苦闷、厌倦、愤恨；另一方面，元文人的浪子心态适性而为，不象魏晋文人那样完全否定旧有的传统价值观，而是在动摇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重新发现和思索人的生命和意义。他们始终不满于自己的生活处境，既无能力去改变社会现实，又不愿向黑暗势力倾斜，于是，不容于世而愤世嫉俗的浪子心态促使他们超脱现实社会礼法的羁绊和传统的礼仪道德。他们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态度越出了封建秩序的藩篱，这无疑对封建统治具有很大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二、大智若愚的智者心态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又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由于“四等人”的民族歧视政策，元代文人不仅仕进无门，而且地位空前低下。他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时，总是抒写他们心中的痛苦、愤懑，呼唤真理和正义的到来。儒家的传统观念使得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马虎，他们认为正义和邪恶是不可调和的，甚至可以舍生取义。但元代黑暗的现实，迫使文人有了另一种表现。他们极力佯装愚钝，不问是非。如马致远《黄粱梦》中“也不知甚的秋，甚的春，甚的汉，甚的秦，长则是习疏狂，耽懒散，佯装钝”。难道，元代文人自暴自弃，是非不分，可谓真的痴呆糊涂了吗？事实告诉我们，他们佯装愚钝完全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却包含着对社会和人生的清醒的深层思考。这正是元代文人充当的又一角色——大智若愚的智者形象。

元代文人对现实的黑暗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只能以这种大智若愚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如张养浩的名作【山坡羊】《潼关怀古》是人们所熟知的：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5[5]}

作品从表面看，似乎是叹谓历代王朝的兴亡，实际上却是哀痛劳动人民在动乱的封建统治政权下所蒙受的蹂躏之苦，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对立的历代王朝的共同本质，对社会历史的深层思考，这富有哲理性的创作，正是，元代文人大愚的外表下的大智慧所在。

依托大智若愚的智者心态，元代文人对传统思想和人生哲学进行了批判和思考。“屈原沉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马致远《拔不断》）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但在元代文人作品却遭到非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屈原固然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但面对昏庸的统治和众人皆醉的局面，他的投江也确实意义不大，只能是自我苦恼地白白丢失自己的性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倒是元代文人看得更清楚，在他们看来，为昏君而牺牲性命，真乃大愚。他们深信当时社会是“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的贤愚颠倒的黑暗年代，传统的士人价值观完全被践踏。面对人生，意义何在？元代文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索，有的及时行乐，有的厌弃人生，有的修仙学道，以求长生。尽管态度积极、消极各不相同，但都是元代文人大智若愚的智者心态对人生进行的深层次思考的产物，是元代黑暗社会的特殊折射。

三、与世无争的隐士心态

在元代，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废止，文人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有的甚至被掳为奴隶。尽管后来也曾恢复过科举，但汉人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要比蒙古人、色目人苛刻的多，而且，即使中第，也不过充当一些毫无紧要的官职。面对现实的黑暗和被奴役的低下地位，知识分子感慨抑郁，愤愤不

^{5[5]} 张月中编《元曲通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0页。。

平。但是元代文人所面临的黑暗势力异常强大，再加上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性，不得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选择一些方法来解脱自己，慰藉自己的心灵，于是乎与世无争的隐士心态便成为他们解脱心灵的最佳途径之一。

元代文人避世隐居和当时全真教有密切关系，全真教对文人转化为隐士起到了重要作用。全真教的形成是在金灭北宋之际，北宋遗民不仕新朝、保全本性的产物，到了元代全真教由于社会土壤更为适宜，便日益发展兴盛。它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许多文人便纷纷隐居遁世，以示反抗。生活上的避世隐居，反映到作品中便是大量的神仙道化剧的产生。这里尤其要提到以“神仙道化”剧而著称，号称“马神仙”的马致远先生。郑振铎先生说：

明人不知欣赏关汉卿而独抬高马致远，可知马氏的作品，如何的投合于文人学士的心境。他是第一个元曲作家，把自己的情绪，整个的写入杂剧和散曲里的。他发牢骚，由牢骚而厌世，由厌世而故作超脱语。这里深足以打动文人们的情怀的。……从他以后，元曲便渐渐产生了文人之所有，作为发泄文人自己的苦闷的东西，而益益的远离了民间了。”^{6[6]}

所以，以马致远为代表，元曲写神仙道化，避世隐居的作品特别多。他们在作品中极力歌唱着避世隐居生活，高度宣扬神仙道化思想。马致远《黄粱梦》中，吕洞宾开始时醉心功名，后经钟离权梦境点化，终于悟道成仙。《岳阳楼》是吕洞宾度脱郭马儿出家，这些作品主要是宣扬看破红尘，出家入道，其主要倾向是厌恶现实，逃避现实。又如李好古《张生煮海》中的张羽是一个普通的、功名未遂的知识分子，他与琼莲倾心相爱，义无反顾地向东海龙王发动了翻江倒海、天翻地覆的坚决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形象是鼓舞人心的。但张羽的反抗得到了神仙的大力支持，从另一侧面宣扬了，只有得到仙道神人（如东华帝君等仙人）的帮助，抗争才能取的胜利。元代文人们虽然一再诅咒、愤恨现实的黑暗和险恶，但又不主张起来斗争，反抗社会，改造现实，而是借助神力来进行精神上的反抗，甚至，有的还极力鼓吹消气去火，忍耐一

^{6[6]} 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77页。

切，装痴作呆，不辩是非。在《忍字记》中，布袋和尚把“忍”字写在刘均的左手上，洗不掉，擦不去，触到之处便留下印迹。别人来骂，要忍；妻子通奸，要忍；想念家产妻儿，要忍。世间万事都要“得忍且忍，得耐且耐，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忍字一字岂非常，一生忍过却清凉。常将忍字思量到，忍是长生不老方”^{7[7]}，这忍乃大乘佛法佛义主要思想之一，这一“忍”就是是非不分。这种神仙长生之乐的歌颂和“忍”字当头的懦弱思想的宣扬，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乌托邦。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麻醉。面对现实矛盾，元代文人以隐士心态净化心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采取鸵鸟式的自我保护方法，避而远之，逃之夭夭；更甚者，用阿Q式的精神满足法自我满足。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麻醉了广大人民，起到了消极的、反面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对他们这种隐士心态做进一步的分析，元代毕竟是个严酷的、高压的黑暗社会，元代文人不敢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和反抗，因而不得不通过佛道隐士剧的形式鼓吹避开现实，与世无争。这就避免了他们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可能，作为隐士，他们不全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实际上，那种朝钟暮鼓、青灯黄卷的出家生活毕竟是丧失人性、极度孤寂冷酷的，现实中的人对人的生活总是很留恋的。神仙道化剧中被度脱的吕洞宾、郭马儿并不是非常情愿地出家入道的，而是在现实中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后，为了自己心灵得到解脱而选择的最佳途径。可见，隐遁是元代文人无奈的选择，但这毕竟包含着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与否定，这种不肯同流合污的态度总比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好得多。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和对待元代文人的这种隐士心态。

四、痛不欲生的苦恼者心态

以弓马之力取天下的蒙古统治者不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废止了科举，导致元文人失去了进身之路。再者，社会的混乱、礼教的崩摧、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得传统思想观念网络陷于瘫痪，元代文人沦为社会的最低层，不及娼妓，与乞丐为伍，“九儒十丐”一语便产生与此。摆脱了千年儒教约束，他们顿时有一种快感，但受轻贱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却时时提醒着他们在无拘无束、放浪形骸之时，不时得想起自己的悲惨处境，使得元文人对人生、社会产生一种悖逆心理，内心世界充满矛盾，极度苦恼，可谓痛不欲生。

^{7[7]} 许金榜主编《元杂剧概论》，齐鲁书社出版，1986年6月一版，第104页。

《荐福碑》中：

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涂越有糊涂富。

张镐正是生活在“儒人不如人”的元代，这种智者受苦，愚者享福的现象是多么的不公平？在儒生们惨痛的呼喊中蕴涵着强烈的不满，在他们反复的诉说中透露着悲愤的抗议。“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善良，越聪明越运蹇”。^{8[8]}元代整个社会是非都是颠倒的，元代文人苦恼心境油然而生。渴望仕进而失意沦落，不容于世却不甘寂寞，欲求逍遥抑不住牢骚，这种苦恼的内心冲突促使他们对现实政治绝望、恐惧。

《王粲登楼》中：

王粲韬略不让姜子牙，谋策不减张子房，胆气不逊于蔺相如，才能不差于管夷吾，用兵决不亚于孙武、韩信。

但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因此他的生活便处于饥寒交迫，家徒四壁的境地。他们信守儒家救世拯民的传统观念，但是无路可投，但他们又清醒地认识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以致于他们在出仕与入世的旋涡中越来越苦恼，对人生，对社会都表示出无奈和痛苦。斗争，性格太懦弱，力量太薄弱；妥协，要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于是，元代文人陷入极度扭曲变态的苦恼心态。

五、顽强叛逆的斗士心态

^{8[8]} 廖奔、刘彦君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78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进步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叛逆性和反抗性，唐·韩愈《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不平则鸣”论，是继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元代作家的“不平则鸣”的创作精神，是他们所处时代社会背景之产物，而元代又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社会极为黑暗的年代，所以，元代文人的复仇反抗斗争心理极其强烈。另外，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促使市民阶层队伍壮大，增强了市民意识，更加要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这无疑使得元代文人斗士心态如虎添翼，对元代黑暗统治和封建礼教传统具有强大的毁灭力。

关汉卿可算元代文人中第一斗士，《窦娥冤》中：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9[9]}

窦娥是一位善良、孝顺、讲贞洁而又最富斗争性的形象，对爱情的有力捍卫，对人格的有力维护，是她对恶势力斗争的主要原由，也是窦娥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指天骂地，但窦娥没有针对某一一人，某一官吏，而是针对“天和地”，这“天和地”正是当时的整个黑暗政权系统。这一段动人心魄的控诉，是窦娥反抗性格的最好证据，增强了反抗意味，反映了关汉卿的顽强的斗士心态。元杂剧总是血淋淋地表现人们的复仇意志的，关汉卿《西蜀梦》中张飞被害后，托梦与哥哥刘备，要求起兵复仇；纪君祥《赵氏孤儿》则详细地描述了忠臣义士们在反迫害斗争中前仆后继、报仇雪耻的英雄事迹。

元代富有叛逆性的爱情剧和斗争性的水浒戏大量出现，原因在于中原文化被辽金所断裂，又被蒙古骑兵践踏得一败涂地。元代文人对思想解放空前自由，加之地位的极其低下，这时反抗思想、斗士心态油然而生，如元曲中大量出现的一见钟情之男女，乍相逢即幽会的男女，《西厢记》、《墙头马上》

^{9[9]} 张月中编《元曲通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6页。

中，不管什么礼教纲常，不管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甚至，歌伎们也纷纷要求婚姻自主，迫切要求摆脱受奴役的命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救风尘》、《金线池》、《青衫泪》都属此类。赵盼儿可称得上一位妓女“皇后”，她聪明、机智、勇敢、而且乐于助人，不仅维护自己得到了的人格，而且，热诚帮助受难姐妹摆脱魔爪。此外，谢天香、杜蕊娘也是斗士形象的杰出代表。水浒戏中也同样塑造了众多斗士形象，“替天行道”是针对元代黑暗社会的，特别是针对蒙古统治者提出的一个革命口号，梁山英雄诛杀权豪势要或其它坏人便是“替天行道”，其中李逵“黑旋风”嫉恶如仇的性格，表现突出。元代文人的复仇反抗的斗士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是元代蒙古族统治者黑暗政权的产物，又是元代市民意识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产物。

六、寻求慰藉的梦中人心态

梦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之一，元代文人也善于借助这一载体来进行创作，进而求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便是元代文人寻求慰藉的梦中人心态形象。元代文人的作品中有关梦的描写绝非凭空捏造的天方夜谭，而是以现实生活这片肥沃的土壤做为原型的。可以说现实是梦的渊源，而梦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元代文人正是以一个个美丽的梦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自身的需要，由低级向高级概括为五个层面，类似于金字塔的形制，由低到高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属最高层级的需要，实现难度大、人数少。元代文人此种梦幻心态正是现实中所缺失的，他们只有借助梦境来满足自己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不放弃某些本能的要求，而痛苦地从‘快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所以，艺术家就象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

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寻找那条回去的路，而再度把握现实。^{10[10]}

梦境这种超越的特性可以使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使悲剧的结局逆转为大团圆式的喜剧尾巴，满足人们心理愿望。

如《窦娥冤》中第四折“鬼戏”的设计，“‘鬼戏’作为《窦娥冤》悲剧审美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非但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它作为悲剧主题展开过程背后那个讽刺的喜剧叙述层面的外观（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把社会悲剧的主题再次推倒高峰”^{11[11]}。这个虚幻的，而又合于美感传达逻辑的喜剧结局，融合了关汉卿创作的虚幻性、想象性和广大人民的期盼清官、昭雪冤魂的美好愿望，折射了元代文人对明君、清官的美好幻想。窦娥的灵魂在父亲窦天章的帮助下得以昭雪，但这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窦娥的冤屈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昭雪，那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梦想。

在情与梦的关系上，爱情之梦表现尤为突出，马致远《汉宫秋》第四折，写汉元帝独处深宫，夜深人静，冷衾孤灯，心头涌起对昭君的深深思念之情。他在恍惚入梦之时，忽然昭君逃回，他大喜过望，正将有个团圆之梦时，却被天空路过的孤雁的“嘎嘎”的叫声惊醒，美梦不成，更陷入痛苦的思念中。这正是灞桥送别后，汉元帝相思过度而致。其中〔收江南〕

“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装。”^{12[12]}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汉元帝梦王嫱归汉正反映了他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此外，郑光祖《倩女离

^{10[10]} 廖奔、刘彦君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527页。

^{11[11]} 叶桂刚、王贵元主编《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64页。

^{12[12]} 黄卉主编《元代戏曲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80页。

魂》、《西厢记》中也采用了浪漫的梦幻笔法，以表达作者追寻真爱的至诚之心。可见，元代文人企图将真爱的美好心愿寄托于梦境，在梦中实现。

元代文人懂得，在现实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等人生目标已无法实现，便借助梦来得到弥补。正如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满足”，现实中政治抱负落空，元代文人便抱着“男儿自有冲天志，不信书生一世贫”的报复心理，到戏曲艺术的自由王国里去抒发苦闷，自我安慰，自我慰藉，追求梦想。如果把戏曲创作作为元代文人编织梦的摇篮，文人们就是在这个摇篮中来实现自己的“功名梦”，拔高自己的地位和存在价值。《破窑记》中吕蒙正与刘月娥住在破窑里，仍然免不了被泰山大人将其唯一的砂锅打破的惨剧，但一朝金榜提名，立刻神气活现，功名到手之日即是胜利之时的团圆梦，强烈地感到文人们希图峥嵘有日，奋发有时。“《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寇准的抗争则有些古调别弹：这两位穿着宋人衣装的元代落魄文人，以自命清高，安贫乐贱的生活态度，抗拒黑暗冷酷，人欲横流的强权社会；并以强烈的功名利禄追求，呼唤着逝去的梦，籍浓重的怀旧意识和自恋心态维持脆弱的自尊心。”^{13[13]}

艺术中所幻想和追求的，正是生活中缺少或没有的，这完全符合艺术真实的创作原理，这些能使元代文人得到慰藉的杂剧创作，正是他们的梦中人心态的体现。

综上所述，元代文人处于元代那个极度黑暗的年代中，注定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生发不同的心态，进而充当不同的角色，是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元文人这个特殊群体所具有多元化的心态特征，而这种种心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断变化而转化，相互关联，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正是这多重的心态构成了元代文人多元化的心态系统。

作者简介：王潞伟，男，生于1983年10月15日，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研究生

^{13[13]} 郭英德主编《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178页。

邮编：041004 电子邮箱：wang13835235271@163.com

厦门大学图书馆